

二战前夕在缅甸的腾冲人^{*} ——聚焦一卷民国档案的微观分析

李 枫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缅甸; 腾冲人; 国际移民; 人口学; 职业特点; 文化认同

[摘 要] 本文以云南省档案馆 92 - 2 - 97号民国档案为中心, 结合口述历史笔记及相关文献资料, 对二战前赴缅腾冲人的人口学特征、职业特点、文化认同进行了分析, 得出结论, 二战前腾冲人赴缅多系“少小离家”, 宗亲、乡亲网络促进了其外迁行为; 二战前夕, 缅甸腾冲人多贩卖杂货谋生, 其商号规模相对有限, 但仍具备较强经济实力; 旅居缅甸时间越久, 腾冲人家庭涵化于当地社会的程度越深, 即便如此, 缅甸腾冲人群体仍保有一定文化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D634.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10) 01 - 0071 - 08

The Tengchong Migrants in Burma before World War I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publican Archival Record

LI Feng

(Research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Burma; the Tengchong 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occupational features; cultural identity

Abstract: Many Tengchong residents emigrated to Burma prior to World War II. Based on a piece of Republican archival record numbered 92 - 2 - 97 kept in the Yunnan Provincial Archives and relevant oral history records and local gazette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m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ccupational fea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engchong migrants who moved to Burma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most of the Tengchong migrants were quite young when emigrating to Burma, and such an emigration was facilitated by the networks of clansmen and fellow villagers. Majority of Tengchong migrants were grocery retailers. They were economically influential in local host society though their businesses were relatively small in size. The longer they settled down in Burma, the deeper they would be acculturated into local society. Nevertheless, to some extent the Tengchong migrant group persistently maintained their cultural heterogeneity.

[收稿日期] 2009-06-22; [修回日期] 2009-10-28

[作者简介] 李枫 (1979—), 男, 彝族,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业 2007级博士生。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为本文实地调研提供了私人资助, 腾冲县图书馆馆长胡晓梅、县侨办主任王根映、和顺乡图书馆馆长寸云广引荐了部分受访者, 云南省档案馆蒋一虹、张玲、杨萍等给予了热心协助, 匿名审稿人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腾冲人外迁缅甸的历史久矣。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群体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并已在当地具备较强经济实力,但已有研究成果中,^①讨论该时期缅甸腾冲人群体经济状况、文化特征等问题的相对不多。本文以云南省档案馆 92-2-97 号民国档案为中心,^②结合笔者驻腾冲调研期间(2008 年 8 月 1—8 日)整理的口述历史笔记及相关文献资料,尝试对二战前夕在缅甸的腾冲人群体展开微观分析。

云南省档案馆 92-2-97 号民国档案中保存的《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系油印宣纸制式表格(表 1),端正楷体书写,手工装订成册,封面落款时间为 1945 年 4 月 29 日。从内容填写的详略程度看,内容较详尽,具有较高文献发掘价值的是“职业”、“精习何种语文”两栏。前者专设经营“何种货品”分目,据之可深化对缅甸腾冲商号经营货品种类的分析;后者不但将缅甸语、印度语及傣夷语、山头语等分门别类,还进一步细分缅甸语为口语、书面语两类,为较详细地研判腾冲人群体的语言能力提供了依据。“居留地”和“将来欲返何地”两栏内容填写则较模糊,缺乏详细地名信息。以下数据均来自这一调查表,不再一一说明。

一、二战前赴缅甸腾冲人的人口学特征

(一) 赴缅甸多系“少小离家”

分析户主“年岁”和“旅居年限”两栏内容,可知 142 户家庭户主离乡赴缅时年岁情况(表 2):^③其一,离乡赴缅时年岁最小者 2 岁,最长者 41 岁;其二,赴缅时 21 岁者人数最多,达 17 人;其三,赴缅行为较密集地发生在 16 至 23 岁间,该年龄段内离乡赴缅者 90 人(约占 63.4%);其四,离乡赴缅时小于(或等于)23 岁者 109 人(约占 76.8%)。由是观之,二战前腾冲人赴缅甸多系“少小离家”,在生存技能相对缺乏、人生阅历尚浅时已相率赴缅谋生,原因何在?

(二) 同宗同乡迁移集中

从户主“姓名”情况看,155 个腾冲人家庭中,户主寸姓的 35 户(约占 23%),李姓的 25 户(约占 16%),杨姓的 23 户(约占 15%),此三大姓氏家庭数合计 83 户(约占 54%)。户主同为张、赵、刘、尹、王、钊、许等姓的家庭分别有 13、9、9、7、7、6、5 户,其余 16 户家庭

① 专著如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年);口述历史笔记如肖泉《缅甸滇籍华侨调查访问集》(暨南大学历史系,1983 年打印稿);非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如李镜天《侨缅回忆录》(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年,第 139~185 页),李致卿《腾冲旅缅华侨经营玉石概况》(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77~183 页),李和仁《腾冲旅缅华侨对抗战的贡献》(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51 辑《情系红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16~219 页),李继东《历史上和顺在缅商号及侨乡文化初探》(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5),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176~192 页),杨发恩《缅北地区腾冲和顺商家社团一览》、蔺以强《和顺人在果领》、张贵林《和顺人在东枝》(杨发恩编:《和顺:乡土卷、华侨卷、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9~35、208~213、214~217 页),寸尊湘《腾冲绮罗的玉石侨商》(云南省玉博会腾冲组委会编:《中国翡翠第一城:腾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202~204 页);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如仲猷《腾侨家庭的缅甸化和教育的落后》(《旅缅腾侨月刊》1932 年第 6 期),李祖汉《对家乡的怀念及期望》(《和顺乡》2003 年第 12 期),黄素芳《对云南腾冲人出国的历史考察》(《东南亚》2006 年第 4 期),等等。

② 1942 年初,日军侵略缅甸,致缅甸腾冲人大量回归;1945 年滇西光复后,他们又陆续复员缅甸。对此,时云南省侨务处行有专项登记,该登记之部分存根现收藏于云南省档案馆 92-2-97 号民国档案中,包括《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157 份,其中涉及腾冲人情况的有 155 份。

③ 其余 13 户腾冲人家庭中,第 44、80 和 94 页家庭户主系缅甸生长;第 24、111 和 144 页家庭未注明(或未填写清楚)户主“年岁”;第 42、99、110、122、123、126 和 137 页家庭未注明户主“旅居年限”。

表 1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表样)

表查调侨华籍省各带一西滇处务侨南云会员委务侨																							
中华民国三十年 月 日 填报	注 备			通 讯	将来欲返何地	对复员意见	生活情况	登记证号码	曾否入党	有何种技能	精习何种语文	损失	归国日期	职业	眷属人数	属留地	省籍	省	县	乡镇	姓名	性别	年岁
	三倘不迅为登记将来即不易返目的地	二生活确属困难者将来酌予救济	一损失如房屋货物工具货币及车辆应确实登记数目及日期地点																				

表 2 二战前腾冲人离乡赴缅时年龄情况

年齡 (段)	2～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41
人數 (百分比)	8	1	0	1	1	3	5	11	9	12	8	8	17	14	11	5	4	3	1	2	4	14
	19 (13.4%)							90 (63.4%)								33 (23.2%)						
	109 (76.8%)																					
	142																					

则户主同姓氏情况较少。可见，寸、李、杨三大姓氏家族更偏好于外迁缅甸，张、赵、刘、尹、王、钏、许等姓家族亦有较浓厚之外迁传统，其余姓氏家族则鲜有外迁缅甸者。

从户主籍贯情况看，源自和顺乡的家庭最多，有 120 户 (约占 77%)，^① 源自小西乡的有 26 户 (约占 17%)，其余 9 户家庭分别源自明朗、中和、东华诸乡。综合户主“姓名”与籍贯情况看，户主同为寸姓的 35 个家庭、李姓 25 个家庭，全部源自和顺乡，杨姓 23 个家庭虽然籍贯各有不同，但户主姓名中排辈现象较明显 (同族可能较大) 的几组家庭仍源自同一籍贯地，如杨发曾、杨发盛、杨发琼 3 人家庭都源自和顺乡，^[1] 杨必应、杨必粹、杨必旺 3 人，^[2] 以及杨苑林、

① 第 147 页家庭 (户主侯炳彝)，籍贯栏填写“腾冲和顺”和“广东梅县”两地，此计入和顺籍。

杨湘林、杨润林、杨竹林、杨恩林、杨梓林、杨堤林、杨植林、杨□(原文空缺)林9人家庭均源自小西乡。^[3]

托马斯等人认为,移民网络对移民目的地选择之影响在于:“其一,提供东道国就业市场信息;其二,移民者对自身族群商品(ethnic goods)的使用(偏好),(可能)带动当地此类商品数量之增加;其三,(新)移民者指望老移民(previous migrants)在其安顿过程中(给予)帮助。”^[4]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对腾冲人外迁缅甸历史之考察。由于种种原因,较早外迁的腾冲人在缅甸“站住脚”后,多选择经年往返于侨居地与家乡之间,他们带回的财富、“夷方”见闻及各种谋生信息,对家乡因耕地紧张而时有饿殍的亲友来说,启发意义较大。此外,“新客”外迁缅甸之初,还可在当地“老移民”中的宗亲、乡亲等处获得第一处居所、第一份职业以及各种关照和提携,其外迁成本和风险因而大为减少。事实上,二战前夕腾冲较有影响的几个大商号,其创始人(或传承人)年幼赴缅时,均或多或少地在缅甸得到过类似帮助,如“永茂和”商号的李德贤^①、“协树昌”公司的许仁钦^②以及“茂恒”商号的王昭明^③等,强大宗亲、乡亲网络的存在并发挥作用,即二战前腾冲人敢于“少小离家”之重要原因所在。

二、缅甸腾冲人的职业特点

(一) 以经商为主,多贩卖杂货

从户主“职业”情况看,填写“商”的149户(约占96%),其余6个家庭,填写为骡马运输的1户、工人的1户、学生的2户,另有2户此栏未填。^[5]可见,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业商者居多,正如李根源1940年3月在诗句中所言,“十人八九缅经商,握算持筹最擅长”。^[6]另据腾侨杨润生回忆,从曾祖父起,其家族已经“在缅甸商场上拼搏并取得成就”,日军入侵后,杨家归途遇阻(日军已先于难民潮侵占滇缅边域),一家老小只得返回已经沦陷的侨居地贺奔(Hopong,亦译和榜)“做些小买卖”,延至1945年8月才辗转回归家乡。^[7]缅甸腾冲人相对卓越的经商才能从中可见一斑。笔者认为,缅甸腾冲人的经商才能,可能使侨居地市场内腾冲人偏好之各类商品相对充裕,降低了“新客”之生活适应成本,进而也对其外迁行为产生了部分引力,此观点可视为对前文提到之移民网络理论(Migration Networks Theory)的一种补充。

149户经商家庭中,注明经营“何种货品”的111户,其中,经营杂货类货品家庭最多,有106户(约占95%);经营饮食、织物等类货品的家庭数依次递减(表3)。另外,“跨界”经营(同时经营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品)的家庭有41户(约占37%),包括经营两种货品者35户、三种货品者5户、四种货品者1户(钊相魁一家同时经营“杂货、谷米、豆、茶”四种货品)。^[8]另据民国《腾冲县志稿》记载,1942年腾冲县城有“解玉行33家,玉肚眼匠27家,玉细花匠23家,玉光工匠25家,玉大货匠31家,玉小货匠37家”;^[9]有学者认为,“做玉石翡翠或红绿(包括紫白色)宝石生意”为战前腾冲人主要执业之一。^[10]而在注明经营货品的111户家庭中,

① 李德贤(1878—1964),13岁随乡人马帮到八莫“光云号”当学徒,后接手家族商号“永茂祥”,并与仰光、曼德勒的腾冲同乡张子耕、张成鑫等集资合股,兴办“永茂和”,并在仰光、八莫、腊戍、昔卜、皎墨、南坎、果领、瑞波、孟拱等地设立分号。参见李镜天:《永茂和经营史略》,杨发恩编:《和顺:乡土卷、华侨卷、人文卷》,第36~47页。

② 许仁钦(1902—1977),15岁随马帮赴缅在恩多寸氏四舅家中做工,1930年回乡开设“合丰”商号,经营批发业务,20世纪30年代末,与族弟许仁让组织“协树昌”公司,许仁让负责国内业务,驻昆明;许仁钦负责国外业务,驻瓦城。参见傅宗明编:《二十世纪永昌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③ 王昭明(1914—1999),17岁进入长兄王少岩与亲友合伙开设的“茂恒”商号工作,1937年被派至“茂恒”商号缅甸分号工作,先后担任过该商号仰光、曼德勒、密支那等分号经理。参见傅宗明编:《二十世纪永昌人》,第95页。

填报经营玉石者仅 1 户，^[11]登记之时恰逢战乱，事主出于各种考虑而虚报、瞒报的可能较大，想必即是个中缘由。

从“眷属人数”看（表 4），注明该栏情况的 130 个家庭共有成员 483 人（不含“从人”），平均每户成员约 4 人，多为由父母加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员两人的家庭最多，有 29 户（约占 22%），成员最多者为 9 人，有 2 户（约占 2%）。成员数与户数之间呈反比关系，成员数越多的家庭，户数越少。此外，填报携带“从人”的家庭有 9 户（约占 7%），其中，从人 1 人者 5 户，2 人者 2 户，3 人和 4 人者各有 1 户。“从人”系相关家庭雇工的可能很大。此假设如若属实，则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商号多系家族经营性质，相关业务多由家人分工协作，较少外雇他人，推知其经营规模亦相对有限。

（二）经济实力较强

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群体经济状况如何？表中未列相应栏目，此仅从“损失”栏填报内容出发，尝试对该问题展开概略分析，称其为概略分析的原因在于：首先，相关数据未经核实，且存在各种干扰因素，如前文提到的时局因素，又如经济状况通常被视为个人隐私，再如该表备注栏曾提到“将来酌予救济”等。其次，即便相关数据相对可靠，也不能直接反映事主实际经济状况，因为两者间不存在绝对的正比关系，如饶有家资者并非一定损失巨大。最后，缺乏同期缅甸国内相关数据，故未能开展横向比较。从数据情况看，填报“损失”栏内容的家庭共 147 户（约占 95%），可见，缅甸腾冲人家庭在二战期间普遍遭遇了财产损失。从损失的程度看，注明金额的 145 个家庭共损失卢比 7,687,360 盾（表 5），^①平均每户约 53,016 盾；寸尊炯一家损失最为惨重（损失不动产折合 35 万盾、动产 115 万盾，合计 150 万盾），^[12]其余家庭损失金额在 1 万～10 万盾间者居多，有 59 户（约占 41%）。假设特定家庭填报的损失金额大于（或等于）其实际资产值，则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家庭资产过万盾者合计超过 50%，部分家庭资产超过十万甚至百万盾。由是观之，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群体是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的。

表 3 二战前夕缅甸腾冲籍商人经营货品分类情况

大 类 *	小类（实际填写名称）/户数	户数合计 **	百分比
杂货类	什货 /27、洋杂 /15、土洋杂货 /3、杂货 /43、小杂货 /2、土杂 /6、土杂货 /1、小零货 /1、土产 /6、土洋 /1、土洋货 /1	106	95
饮食类	谷米 /12、谷子 /4、粟米 /2、米 /1；茶园 /1、茶 /2、茶叶 /2；饼干 /1、饼干铺 /1、豆 /2、果品 /1、纸烟 /1；菜馆 /1、咖啡馆 /1	32	29
织物类	匹条 /8、衣服 /1、花纱 /1、布匹 /1、棉纱 /1	12	11
其他类	玉石 /1、印刷 /2、缝纫 /1、牧业 /1、小本营生 /1、汽车运输 /1、车运 /1、练习员 /1	9	8

注：* 为方便统计，将原表中指代同种“货品”而“实际填写名称”各异者，或指代相近性质“货品”者分别列入杂货、饮食、织物三大类，其余统入其他类。

** 部分家庭同时经营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品”，故此栏数据总和已超过 111 户。

① 有 2 个家庭未注明金额。分别是：第 114 页家庭（户主杨本荫，“损失”栏填写“杂货约值卢比壹万余千盾”）和第 115 页家庭（户主明其诗，“损失”栏填写“棉花 50 驮”）。此外，英属缅甸主要流通货币为印度卢比（Indian Rupee，NR），如梁金山在仰光码头充任码头工时“一天可赚 6 至 10 卢比”；马家珍谈到当时缅甸华人“人头税一年 5 卢比”，参见肖泉：《缅甸滇籍华侨调查访问集》（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藏，1983 年打印稿）第 47～51、53～55 页。笔者认为，该卷档案中提到的货币名称及单位，如损失“卢比 × 盾”，似可作如“人民币 × 元”解，为忠实原文计，在此不予改动。

表 4 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家庭规模

成员数* 户数 从人数	9	8	7	6	5	4	3	2	合计 (百分比)
0	3	3	5	11	19	24	28	28	121 (93%)
1	0	0	1	1	2	0	0	1	5 (4%)
2	0	0	0	1	0	1	0	0	2 (2%)
3	0	0	0	0	0	1	0	0	1 (1%)
4	0	0	0	1	0	0	0	0	1 (1%)
合计 (百分比)	3 (2%)	3 (2%)	6 (5%)	14 (11%)	21 (16%)	26 (20%)	28 (22%)	29 (22%)	130

注：* 含户主。

表 5 1945年缅甸腾侨填报战争期间损失情况

类别	户数	(百分比)	金额 (单位：盾)
≤1000	22	15%	9,540
1,001~10,000	43	30%	202,020
10,001~100,000	59	41%	1,734,900
100,001~1,000,000	20	14%	4,240,900
≥1,000,001	1	1%	1,500,000
合计	145		7,687,360

三、缅甸腾冲人的文化认同

(一) 居住年限

从“旅居年限”看(表6)，注明情况的145个家庭中，旅居年限少于10年的家庭最多，有63户(约占43%)；多于41年的最少，有2户(约占1%)。此外，旅居年限与户数呈反比关系，即越早外迁者，战争期间越少回归，“天涯住稳归心懒”，可以推测相关家庭涵化于当地社会的程度也较深；而旅缅时间较短的家庭则涵化有限，遇侨居地情况发生变故时，其选择回归的概率较大。

表 6 1945年缅甸腾侨旅居缅甸年限情况

年 限	≥ 41	31~40	21~30		11~20		≤ 10	
			26~30	21~25	16~20	11~15	6~10	1~5
户 数 (百分比)	2 (1%)	6 (4%)	8 (6%)	17 (12%)	21 (14%)	28 (19%)	30 (21%)	33 (23%)
			25 (17%)		49 (34%)		63 (43%)	

(二) 语言能力

从户主语言能力看,填报“精习何种语文”栏内容的家庭有136户(表7)。分析可知,其一,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大都具备一定缅甸语言能力,略知或精习缅甸语者比例达到100%,与当地人沟通,语言障碍较少;其二,就其缅甸语程度而言,略知口语者约占10%,精习口语者73%,兼具口语、书面语交流能力者18%,可见缅甸腾冲人对缅甸语之掌握,多满足于口语交流目的,对掌握书面语热情不高,可以推测其在缅甸“落地生根”的意愿也相对较低;其三,在缅甸语之外,部分人(约占14%)还可运用傣夷语、山头语、印度语等进行交流,可知以经商为主的缅甸腾冲人,其业务对象可能扩展至部分少数民族及印度移民中间;其四,填报“略知缅甸语”的13人中,5人旅缅时间已超过10年,其中1人甚至生长于缅甸。^①长期旅居甚至生长于缅甸者,仍有可能对缅甸语掌握程度不高,猜测腾冲话(或云南方言)在缅甸腾冲人聚落相对强势,^②或者说在语言文化上,缅甸腾冲人群体与当地其他族群相比,保有一定文化异质性。

(三)文化认同

涵化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认为,涵化指移民个体或外来族群,对于其原生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之认同程度,主要发生于“当少数民族对优势族群之行为(模式)、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持积极态度,而对自身族群文化(特)消极(态度)时”,^[13]“弱势文化通过对强势文化之模拟(imitation),而使自身产生改变。”^[14]就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群体的实际情况而言:其一,腾冲人群体乡土观念浓厚,年少赴缅投靠宗亲、乡亲等,成年后多回乡完婚,婚后再度外出,并通过在外经营所得供养家中妻儿老小。^[15]不排除部分人在缅甸兼娶“缅妇”并开枝散叶,然其男性后代仍多送回家乡教养,长成后又多奔赴缅甸接手家族商号,父辈们退休后即回归家乡颐养天年。其二,腾冲人自豪于自身具备的中华文化特征,并注意加以弘扬,如和顺旅缅同乡促进会门联所云,“旅居四夷汉族勿为夷族化,缅怀千古今人不让古人贤”。^[16]其三,腾冲人群体多聚居于缅北主要市镇,形成相对封闭的亚文化聚落(subculture settlements),如1871年缅甸新街(Bhamo)“滇人居此者约千余,腾越人居其九”,^[17]这为中华文化特征的传承创造了空间。上述情况违背了涵化理论中涵化达成之诸要件,也是缅甸腾冲人群体身上中华文化特征(以语言能力为代表)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然而,诚如时人在《腾侨家庭的缅化和教育的落后》一

表7 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语言能力

类别 X \ 类别 Y*	X	X + A	X + A + B	合计 (百分比)
略知缅甸语	13	0	0	13 (10%)
缅甸语	81	15	3	99 (73%)
缅甸语、缅文	22	1	1	24 (18%)
合计 (百分比)	116 (85%)	16 (12%)	4 (3%)	136

注: * 此栏中“X”表示掌握一种语言(即“类别X”栏中语言),“X+A”、“X+A+B”分别表示同时掌握“类别X”栏中语言及另外一种或两种语言。

① 分别是第38页家庭(户主许本琳,旅缅20年)、第44页家庭(户主张清园,缅甸生长)、第61页家庭(户主徐恩寿,旅缅23年)、第66页家庭(户主钊嘉璠,旅缅10年)和第157页家庭(户主李祖林,旅缅13年)。

② 相关问题值得另题讨论。据和顺乡“××××”玉石店老板赵××称:“我们在呢边(缅甸)有不少亲戚,现在他们中呢第三代人已经不会讲中国话了”(访谈时间:2008年8月2日,地点:腾冲县和顺乡);而参加“中国寻根之旅”缅甸贵概地区华裔青少年夏令营的师生们则介绍了当地通用华语情况。带队老师匡××(祖籍龙陵)介绍:“我们平时在呢边讲云南方言,上课时么用(中文)普通话授课”;李××同学(祖籍腾冲)说:“在家我们都是讲现在讲呢之种话(腾冲话)”(访谈时间:2008年8月7日,地点:腾冲县腾越文化广场)。

文中所云,腾冲男子旅缅既久,“多半与居留地的女性结婚,生育子女,组织客地家庭,对于种族的观念,多半忽视,土生子女,并未施以中国家庭教育,事事与缅甸同化”。^[18]可见,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群体之文化异质性也是相对有限的。

结语

通过以云南省档案馆 92 - 2 - 97 号民国档案为中心的微观分析,本文结论如下:第一,二战前腾冲人赴缅多系“少小离家”,强大宗亲、乡亲网络的存在并发挥作用,即是个中原因所在;第二,二战前夕,缅甸腾冲人多以经商谋生,主要贩卖杂货类货品,其商号多为家族经营性质,各项业务主要由家庭成员分工协作,较少外雇他人,规模相对有限,但在当地仍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第三,旅居缅甸时间越久,腾冲人家庭涵化于当地社会的程度越深,对当地社会也更为认同,遇侨居地情况发生变故时,其选择回归家乡者相对较少,但在语言文化上,缅甸腾冲人群体与当地其他族群相比,仍保有一定文化异质性。

〔注释〕

- [1]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1945 年 4 月 29 日, 云南省档案馆 92 - 2 - 97 号民国档案, 第 40、63、148 页。
- [2]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126、133、144 页。
- [3]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120、121、129、136、138、140、141、142、143 页。
- [4] Thomas Bauer, Ira Gang and Gil Epstein, “What Are Migration Networks?” 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s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Rutgers University, No. 200, Sep. 2000, pp. 1 - 5
- [5]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3、15、94、95、42、65 页。
- [6] 李根源:《和顺乡 (1940 年 3 月)》, 见许秋芳:《腾冲华侨诗文选》,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年, 第 58 页。
- [7] 杨润生、李继东:《缅甸沦陷逃难记》, 见张志芳:《腾越文化研究》(2),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 第 185~203 页。
- [8]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68 页。
- [9] 《腾冲县志稿》卷二十第十二商务, 民国三十一年 [责任者不详] 油印本, 第 10 页 a~10 页 b。
- [10] 尹文和:《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第 21~22 页。
- [11]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72 页。
- [12] 《滇西一带各省籍侨民调查表》, 第 56 页。
- [13] Rudmin F. W. and Ahmadzadeh V., “Psychometric Critique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The Case of Iranian Migrant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1, 42, pp. 41 - 56
- [14] Ross E. A.,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Century co., 1920, p. 227.
- [15] 肖泉:《缅甸滇籍华侨调查访问集》(打印稿), 广州: 暨南大学历史系, 1983 年, 第 58~59 页。
- [16] 杨发恩:《和顺的一半在缅甸: 兼论旅缅和顺联谊会》, 见杨发恩:《和顺: 乡土卷、华侨卷、人文卷》,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第 140~101 页。
- [17] 王芝:《海客日谭》卷一, 清光绪二年精刻本 [责任者不详], 第 21 页。
- [18] 仲猷:《腾侨家庭的缅化和教育的落后》, 《旅缅腾侨月刊》1932 年第 6 期。